



搅局者

Limonov



[法]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 著
Emmanuel Carr è re

马振骋 译

搅局者

Limonov

[法]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 著
EMMANUEL CARRÈRE
马振骋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搅局者 / (法)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著；马振骋译。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496-1863-7
I. ①搅… II. ①埃… ②马… III. ①利莫诺夫—传
记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7266号

Limonov by Emmanuel Carrère © Editions POL, 2011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6-739

搅局者

作 者/ [法]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
译 者/ 马振骋
策 划/ 陈 丰
责任编辑/ 何 璟
特约编辑/ 徐曙蕾 康 华
装帧设计/ 尚世视觉
出 版/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邮 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装订/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20×1270 1/32
印 张/ 10.75

ISBN 978-7-5496-1863-7

定 价/ 45.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发行方联系。

目录

- 1 / 序 幕 莫斯科 2006年10月 2007年9月
- 21 / 第1章 乌克兰 1943—1967
- 67 / 第2章 莫斯科 1967—1974
- 91 / 第3章 纽约 1975—1980
- 141 / 第4章 巴黎 1980—1989
- 173 / 第5章 莫斯科、哈尔科夫 1989年12月
- 195 / 第6章 武科瓦尔、萨拉热窝 1991—1992
- 219 / 第7章 莫斯科、巴黎、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 1990—1993
- 255 / 第8章 莫斯科、阿尔泰 1994—2001
- 293 / 第9章 托沃堡、萨拉托夫、恩格斯 2001—2003
- 323 / 尾 声 莫斯科 2009年12月

序幕

莫斯科 2006 年 10 月

2007 年 9 月



I

直至 2006 年 10 月 7 日，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她的公寓楼道里遭人枪杀以前，只有密切关注车臣战争的人，才知道这位勇敢的女记者的姓名，她公开反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政策。一夜之间，她忧郁而坚定的面孔在西方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我那时刚好在俄罗斯一座小城里拍纪录片，经常在该国逗留，因而这条消息一传出，有一家杂志社建议我搭上第一班飞机前往莫斯科。我的任务不是调查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遇刺案，而是让那些认识她和爱她的人谈谈。这样我在《新报》办公室里待了一星期，她曾是该报的明星记者。这期间，我也去了保卫人权的联合会和车臣死伤军人的母亲组成的委员会。他们的办公室空间局促，光线幽暗，配备几台破旧的电脑。接待我的人一般也都上了年纪，人员少得可怜。这是一个极小的圈子，彼此熟悉，我与里面的人很快就相识了；实际上组成俄罗斯民主反对派的也只是这个极小的小圈子而已。

在莫斯科除了这几位俄罗斯朋友以外，我还认识另一个小圈子，是由法国侨民、记者或商人组成的；当我白天采访完毕，晚上向他们讲述时，他们露出一丝怜悯的微笑。我对他们谈起的这些正直的民主派，这些人权战士，当然都是可尊敬的人，但是说实在的，没人把他们当一回事。他们未战先输了，因为在这个国家只要让每个人都有发财的权利，谁都不关心那些形式上的自由。然而，法国舆论界流传的一个话题叫我的侨民朋友觉得好笑，或者感到气恼，那要视各人的性格而定；据这条流言说，谋杀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由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FSB）授意的。FSB 是政治警察，在苏联时代称为克格勃。

“得了，”帕维尔说，他是一位法籍俄裔大学教员，现已转入商界，“不可以这样胡说八道。你知道我在——大概是在《新观察家》里——看到了什么？文章说，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好像碰巧在普京生日那天遭到暗杀，这总是很蹊跷。好像碰巧！这种好像碰巧居然白纸黑字写了出来，你可以体会到其中的混账程度吗？你能想象那个情境吗？在国家安全局内开会议论事情。老板说：弟兄们，大家要动动脑筋了。过几天是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生日，真的应该去找个他见了会开心的礼物。谁有什么想法吗？这引起大家的沉思，然后有个声音响起：我们是不是给他献上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脑袋，这个女混蛋总是不停地批评他。会场上一阵赞同的嗡嗡声。好主意，就是它了！孩子们，行动吧，怎么干都可以。原谅我，”帕维尔说，“但是这样的剧本我是不会去买的。最多也只是《亡命的老舅们》的俄罗斯重拍片。这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像普京所说的，这件事深深撼动西方正义人士的灵魂；暗杀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对克里姆林宫造成的伤害，要远远超过她生前所写的文章，那些东西登在报刊上是没人会去看的。”

在这些人出天价租赁的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美丽公寓里，我听

着帕维尔和他的朋友维护权力机关，说第一，事情原本可能会糟糕一千倍，第二，俄罗斯人会很高兴——那是以什么名义教训他们呢？但是我也听一些悲哀和精力不济的女人，终日向我诉说一些不挂牌照的汽车半夜来劫人的故事，那些士兵不是受敌人而是受他们上级的折磨，尤其目无法纪。这些事不断发生。警察或军队无不腐败，这是情理中的事。视人命如同草芥，这是俄罗斯的传统。但是当普通老百姓顶着风险要求当局给个说法，这些权力代表蛮横粗暴，深知自己决不会受到惩罚。这是那些军人的母亲，在高加索别斯兰学校遭屠杀的儿童的母亲，在杜布洛夫卡剧院牺牲者的亲属所不能容忍的事。

让我们回到 2002 年 10 月。全世界电视台有三天只播放这一件事。剧院还在上演一出喜歌剧《北—东》，车臣恐怖分子把全体观众劫持为人质。特种部队排除一切谈判，决心向人质和人质劫持者施放毒气解决问题。平民死亡人数有所争议，约在一百五十名左右；他们的亲属要是问到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对待这些人和这些人的葬礼是否应该更加隆重一些，都会被当作恐怖分子的同谋对待。此后每年，他们都集会进行纪念活动，警察不敢明目张胆禁止，但是会监视，好像这是一场聚众闹事——事实上也确实变成了这样。

我去了那里。以我看来自剧院前面的广场上约有二三百人，在他们四周也有同样数目的特种警备部队，相当于我们法国的共和国保安警察，也像他们一样戴钢盔，持盾牌和粗大警棍。天空下起雨来。有几把雨伞在蜡烛上方打开，为了防止烧熔的蜡烫着手指，蜡烛都由纸做的颈环包着，令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带着我前往参加复活节的东正教礼拜。标语牌代替了圣像，上面贴着死者的相片和名字。擎着这些标语牌和蜡烛的人都是孤儿、寡妇和鳏夫、失去孩子的父母——这在俄语中也不比在法语中有更多的报道。政府中没有一个

代表前来，一名家属代表生着闷气指出这一点，他发表了几句话，整个仪式中也仅此这几句话。没有演说，没有口号，没有歌声。大家只是在围成一圈的特警部队的防御线内，默不作声站着，手举一支蜡烛，或者三三两两低声说话。我环顾四周，认出了好些人：除了出丧人家以外，还有这个反对派小圈子里的全班人马，从上星期以来，我逐一拜访过他们——我跟他们相互点点头，表示适当的悲情。

在剧院关闭的大门前，台阶高处，有一个人影在我看来好像有点熟悉，但是我没法确定这是谁。这个男人穿了一件黑大衣，像其他人一样拿一支蜡烛，他跟围着他的几个人悄声说话。他居于圈子中心，虽在不显眼的位置，也引人注目，给人是个重要人物的印象，我奇怪地联想到这是个黑帮领袖，带了他的贴身保镖，来参加一个同道的葬礼。我只看到他的侧面，从翻起的大衣领口露出一撮胡子。我身边的一位女子，立刻把他认了出来，对她旁边的那个女人说：“爱德华在那里，没错。”那个男人转过头来，好像尽管有段距离他还是听到了。蜡烛光把他面孔的轮廓勾勒了出来。

我认出了利莫诺夫。

2

我已有多少时候没有想到他了？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认识他的，那时他已经在巴黎住了下来，他的那部丑闻小说《俄罗斯诗人偏爱黑大汉》获得成功，正在风头上。书中叙说他从苏联移民到纽约后的那段悲惨又精彩的故事。打零工，在一家肮脏的旅店里、有时在街头苟延残喘过日子，跟同性与异性乱搞，酗酒，盗窃，打架；从暴力与反抗来看，使人想起罗伯特·德尼罗在《出租车司机》一片中表现的城市堕落；从生命的力度来说，让人想起亨利·米勒的

小说，利莫诺夫也有食人部族的那种坚不可摧的肌肤和不动声色的表情。这部书并非一无是处，跟作者见了面也不感觉失望。那个时期，平常见到的苏联持不同政见人士，都是神色肃穆的大胡子，穿着很差，住在小公寓里，里面都是书和圣像，他们整夜谈论用东正教拯救世界的道理。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性感、狡猾、很会逗趣的人，样子看起来既像值班船员，又像摇滚明星；那时朋克风行一时，他宣称的英雄人物是约翰尼·罗顿，性手枪的领袖，他毫不在意把索尔仁尼琴看成是个老混蛋。这种“新浪潮”不同政见派也颇为新鲜，利莫诺夫到来时，已经是巴黎文学小圈子里的红人，而我那时还刚刚出道。他不是写虚构小说的作家，他只会叙述自己的生活，但是他的生活激动人心，他又说得生动有趣，文笔简练，言之有物，毫不花里胡哨，笔风有力，像个俄罗斯杰克·伦敦。他写了他的流亡日志后，又出版了他的早年回忆：在乌克兰哈尔科夫郊区度过的童年，然后又是青少年犯罪经历，然后又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在莫斯科成为先锋派诗人。他谈到这个时代和苏联既怀旧又带嘲讽，仿佛这是聪明伶俐小无赖的天堂，经常还在晚宴终席时，其他人都已经醉醺醺，而他不，因为他酒量奇好，他赞扬斯大林，大家把这算作是他爱好挑衅而已。他在《国际白痴》上发表文章，这是让·艾顿·哈利尔办的杂志，意识形态上不是正牌，但是搜罗了一些反传统的文人才子。他爱打架，对女孩子真是手到擒来。他姿态潇洒，还有他的冒险事迹，也使我们这些布尔乔亚青年肃然起敬，利莫诺夫是我们的野蛮人，我们的无赖；我们崇拜他。

当苏联解体时，事情开始发生奇异的转变。大家都为此兴高采烈，而他不，他宣称要把戈尔巴乔夫押上刑场时，决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样子。他就此消失无踪，到巴尔干半岛长期旅行。有人在那里惊骇地发现加入了塞尔维亚军队——后者在我们眼里几乎等同于纳粹

或搞种族灭绝的胡图屠夫。有人在一部 BBC 纪录片中看见他对着围困中的萨拉热窝扫机枪，旁边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军领袖、老牌战犯拉多万·卡拉季奇，用仁慈的目光看着他。他干了这些丰功伟绩后，回到俄罗斯，在那里创立一个政党，名字很动人，叫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有几次在报道中出现穿黑衣的光头青年，在莫斯科街道上游行，边走边行半希特勒（举臂）半共产主义（握紧拳头）敬礼，高呼口号，如“斯大林！贝利亚！古拉格！”（言外之意是：把他们还给我们吧！）他们高举的旗帜是模仿第三帝国的，用镰刀与锤子代替了卍字。那个戴棒球鸭舌帽的狂热分子，抓了喇叭筒挥舞手臂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我们这个谈笑风生、逗人喜爱的大孩子，几年以前，我们都为做了他的朋友而自豪。这种感觉是奇怪的，就像发现中学老同学变成了一个江湖大盗，或者奋不顾身加入恐怖分子的袭击行动。我们回想他这个人，他的过去，试图寻找这一连串境遇的变化，这其中的联系，促使他的生活与我们渐行渐远，竟会相差那么大。2001 年，我们听说利莫诺夫被捕，经过审判还关了牢，这其中内情很不清楚，好像是在哈萨克斯坦贩运武器，企图发动政变。还说什么有人在巴黎兴师动众，签名请愿，要求恢复他的自由。

我不知道他已经出了狱，更吃惊的还是在这里遇见他。他不像以前那么摇滚，更加知识分子化，但是身上还是聚集原来的气场，动作利落有魄力，在一百米以外也能让人感受到。有一批人对他在此地出席显然很感动，排了队前来向他致敬，我犹豫是否也排在这些人后面，但是我有一时与他的目光交叉，由于他不像把我认了出来，而且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也就算了。

我被这次相遇搅乱了心，回到旅馆，又有一件想象不到的事等待着我。在浏览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文集时，发现她两年前追踪报道过国家布尔什维克党三十九名战士一案，他们被控闯入和捣

毁总统办公所在地，嘴里高喊：“普京，滚蛋！”为了这桩罪行，他们被判了重罪监禁，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为他们高声辩护：这些年轻人勇敢正直，可以说只有看到他们，才对国家的正气与未来寄托了希望。

我对此不胜诧异。这件案子好像已经归档，不再重审：利莫诺夫是可恶的法西斯分子，带领一群光头党打手。而今一位死后一致被看成圣女的记者，谈到他，谈到他们，仿佛是在谈俄罗斯民主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在互联网上叶莲娜·邦纳也唱同样一个调子。叶莲娜·邦纳！她是安德烈·萨哈罗夫的遗孀，萨哈罗夫是伟大的学者，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伟大的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的夫人居然也认为这些纳布是好人。“纳布”这个名字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学到的，是俄罗斯对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称呼。她还说，应该建议他们把党的名称改一改，这尤其在某些正派人的耳朵里总是不好听。

几个月以后，我听说有一个新党成立了，名为“另一个俄罗斯”，是由加里·卡斯帕罗夫、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和安德烈·利莫诺夫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一个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际象棋大师之一，一个是普京手下的前总理，一个按我们的标准来说是不可交往的作家：奇怪的三驾马车。显而易见的是有些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可能利莫诺夫本人没有变化，但是他在国内的地位有了变化。帕特里克·德·圣埃克苏佩里我认识时是《费加罗报》的通讯记者，他正在推出一份纪实刊物，当他问我是不是有文章可以登上创刊号，我就毫不犹豫地回答：“利莫诺夫。”他两眼滚圆地瞧着我：“利莫诺夫，这个小混混。”我说：“我不知道，应该写起来看。”

“好的，”帕特里克也没多问为什么，当机立断：“写起来看吧。”

循迹追踪花去我不少时间，我从莫斯科的一位编辑沙夏·伊凡诺夫那里得到他的手机号码。这个号码我有了之后，却又隔了一段时

间去拨通。我对于用什么语气犹豫不决。不单是与他面对面时，还有自己怎么想：我算是一个老相识还是多疑的调查员？应该说俄语还是说法语？以你相称还是以您相称？这些犹豫我都记得，却奇怪地记不得我一拨通电话，第二声铃声还未响起，他拿起话筒时，我说的是句什么话。我大约报出了我的名字，他没有一秒钟的迟疑，就回答说：“啊，埃马纽埃尔。怎么样？”我因为意料不及，结结巴巴说了声好的。我们彼此不是很熟悉，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我本来想到我应该让他想起我是谁，他却立即接下去说：“去年您参加了杜布洛夫卡的仪式，不是吗？”

我说不出话来。我隔了一百米的距离，确是长时间盯着他看，但是我们的目光不曾有片刻交接，他那里既没有须臾停顿，也没有抬起眉毛，表示他把我认了出来。稍后，我从惊讶中恢复过来，想到我们的编辑朋友沙夏·伊凡诺夫可能跟他提起我会打电话给他，但是我沒有对沙夏·伊凡诺夫说过我去了杜布洛夫卡剧院——真是神秘莫测。后来我明白这不是什么神秘，只不过是他记忆力惊人，还有同样惊人的自制力。我对他说我要对他写一篇长文，他毫不推却，接受我在他的身边待上两周——“除非，”他加上一句，“我又被关进监狱。”

3

两个穿牛仔裤、黑上衣、半统靴的光头壮小伙子来找我，去见他们的领袖。我们乘上一辆烟灰玻璃黑色伏尔加穿越莫斯科，我几乎作好准备让人蒙上眼睛，然而没有，我的守护天使只是迅速察看一下大楼院子，然后是电梯轿厢，最后是楼道，从那里走向一套阴暗的小公寓。这里像空房子那样毫无陈设，另外两个光头在里面抽烟打发时间。他们中有一位告诉我，爱德华在莫斯科分住在三四个

地方，尽可能频繁地变换地址，也不遵照固定的时刻，不带保镖——也就是他党里的战士——决不外出一步。

我遵命耐心等待时，就在想我的报道开场不错：秘密接头地点，地下活动，这一切都浪漫之至。只是有点为难的是这篇浪漫报道有两种写法，我采取哪一种呢：恐怖主义还是抵抗组织，卡洛斯还是让·穆兰？^①——不是么，当游戏还没有结束，历史还没有官方定论，这两者还是挺像的。我也在问自己，利莫诺夫想从我的采访中期待什么呢。西方记者有时把他说得如此不堪，使他心有余悸，从而对我抱怀疑态度，还是信任我给他平反呢？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已经准备去采访谁，写谁，又不知道从何入手，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终于把我引进一间陈设简陋、窗帘拉上的办公室，他站在那里，穿牛仔裤，黑羊毛套衫。握手，没有笑容。态度警觉。在巴黎，我们以你相称，但是在电话里他对我称“您”，我们也就用“您”。他的法语尽管缺乏使用的机会，说得还是比我的俄语好，那就说法语吧。从前他做俯卧撑和练哑铃，每天一小时，他应该还是继续不辍，因为他年已六十五岁，体型还是瘦削：腹部平坦，侧影像个年轻人，皮肤像蒙古人那么光滑发暗，但是他此后留起了灰白色的山羊胡须，使他看起来有点像《二十年后》里的老年达达尼昂，更像一名布尔什维克政委，尤其像托洛茨基——除了据我所知托洛茨基不做健身运动。

我在飞机上把他最好的作品之一重温了一遍，那是《失败者日记》，在封底说明此书的特色：“如果查尔斯·曼森或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写过一部日记，或许会与这部书相仿。”我在记事本里摘录了几段。比如说这段：“我梦想来一场暴动。我永远成不了纳博科夫，我永远不会迈着多毛的双腿，跟在英国人后面奔跑在瑞士草地上追

^① 卡洛斯（1949—），冷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1994年被捕，后被判终生监禁。让·穆兰（1899—1943），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领袖。

蝴蝶。给我一百万，我去买武器，到随便哪个国家去煽动一场起义。”这是他三十岁身无分文流亡、踯躅在纽约街头时，给自己讲述的一部剧本，而今三十年后，那部电影正在拍摄。他在里面扮演自己梦想的角色：职业革命家，城市游击队设计师，坐在装甲列车里的列宁。

我对他说起这段话。他听了笑笑，一声干笑，并不和善，鼻孔喷出大气。他承认说：“是的。我一生都在执行我的规划。”但是他看事物很现实：武装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他不再梦想来一场暴动，而是梦想来一场橙色革命，像不久前乌克兰发生的那种。一场和平的、民主的革命。据他说克里姆林宫对此尤为害怕，准备动用一切手段把它扑灭。也是这个原因使他过着这种逃犯的生活。几年前，他被棒球棒打得遍体鳞伤。就在最近，他侥幸逃过一场暗杀。他的名字出现在“俄罗斯敌人”名单前几名，也就是可以任意宰杀的人，接近政权人士把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任意泄露，放出谣言煽动群众搞仇杀。这些名单上的其他人是：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已被枪杀；前俄罗斯国家安全部官员利特维年科，揭露了组织的罪恶溢权行为后，被钋-210毒死；亿万富翁霍多尔科夫斯基表示要投身政界后，到今天还囚禁在西伯利亚。下一个人就是他，利莫诺夫。

第二天，他与卡斯帕罗夫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大厅里，在我报道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时遇到的战士大部分都在，还有不少记者，主要是外国记者。有些人好像非常激动，比如一个瑞典摄影组，不但要拍一部小报道，还要花三个月做成一部完整的纪录片，他们希望这是“另一个俄罗斯”运动的不可抗拒的兴起。这些瑞典人好像对这件事坚信不移，一旦卡斯帕罗夫和利莫诺夫掌权，他们这部片子就可高价卖给全世界。

前象棋冠军身强体壮，笑容热情，亚美尼亚犹太人的美丽头颅；当他们两人登上主席台，他的气场要胜过利莫诺夫。后者留山羊胡子，

戴眼镜，隐藏在那位天然领袖的影子下，好像扮演临阵不乱的战略家角色。然而，直截了当出击的还是这位卡斯帕罗夫，他说明为什么明年——2008年——举行的总统大选将是一个历史性机会。普京完成了他的第二届任期，宪法禁止他连任第三届。他的独行其是使周围的人都无足轻重，以致执政党里没有一个候选人可以脱颖而出。在俄罗斯历史上，民主反对派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机会。媒体都受到箝制，大家不知道俄罗斯民众对于寡头政治、腐败、联邦安全局作威作福有多么痛恨，而他卡斯帕罗夫知道。他能说会道，大提琴般的嗓音抑扬顿挫，我开始在想可能瑞典人是对的。我不禁相信自己是在参加波兰团结工会了不起的前期活动。这时候我身边一个英国记者嘿嘿冷笑，同时带着一股酒气喷着我说：“胡说八道。俄罗斯人崇拜普京，他们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部糟糕的宪法可以阻止他们连续三次选举这么英明的总统。但是您不要忘记其中有一个窍门：宪法禁止的是连续三次连任。没有说不可以来个花招，让一个稻草人上台把位子坐坐热，等着他回来。您看着吧。”

这句旁白对我犹如冷水浇头。一下子，真相又回到现实主义者身边，这些人知道内情，不会让人糊弄；又回到我的善于观察的朋友帕维尔那边，据他说，在俄罗斯说到民主反对派，就像国际象棋中的“王”“车”易位，这个做法规则上没有出现过，从前没有，今后也永远不会有。一分钟前我还准备把卡斯帕罗夫看成是俄国的瓦文萨，而今却成了一个弗朗索瓦·贝鲁^①。他的演说在我看来夸张啰嗦。我的邻座与我就开始像不用功的学生在教室后座很默契地交换黄色图片，我给他看我刚买的一部利莫诺夫的书，除了塞尔维亚哪儿都没有出过译本，书名叫《解剖英雄》，里面有一张泛黄的照片，利莫

^① 弗朗索瓦·贝鲁（1951—），法国民主联盟主席。2002、2007年两次竞选法国总统，均落败。